

专刊导言

清华大学 刘 蔷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有相当多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财富是以经典文献的形式记录并传承的。而出版与收藏正是这些经典文献得以世代相传的两个重要环节。以造纸、活字印刷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既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成为我国古代出版业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础。同时,历朝历代官方或私人重视收藏的传统,使中华典籍不断累积,历久弥新。而且出版与收藏二者之间还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出版者以稀见藏书为底本付梓流通,使珍本再度化身亿万,嘉惠学林。我理解,本期《文献》杂志以“出版与收藏”为题命名专刊,应当体现了编辑团队类似的思考。

本期共刊发十篇文章,既有对出版或收藏的个案研究,也有对这两个环节隐含联系的勾勒与揭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对出版活动的研究,计有四篇,上起中国早期(五代)雕版印刷实践,下至清代官刻本最后的辉煌,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意义非比寻常。

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板刻《九经》之事,明确见载于司马光《资治通鉴》,这一说法在《通鉴》系列书籍如宋《通鉴纲目》、明《资治通鉴补》、清《通鉴辑览》中被广为传录,宋代史料笔记也多有引用。明清以来,每当追溯古代刻书历史,都对此深信不疑。至民国时期,王国维早年未见《资治通鉴》记载,曾对毋昭裔板印《九经》有所怀疑,当看到《通鉴》记载后由疑惑转而肯定。此后出版的中国书史、印刷史相关著作或沿袭旧说,或避而不谈,一直未见对此说的分析思考。此说关乎雕版印刷源流、蜀地文化史以及儒家经典刊刻起始,确有必要对材料做一番全面梳理,以廓清混淆。王媛《毋昭裔板刻〈九经〉质疑》一文搜集宋人的相关记载,辨析“毋昭裔板刻《九经》”之说的来源,又结合五代两宋监本、蜀石经的刊刻,证

明毋昭裔板刻《九经》并非史实,只是主持石刻《九经》的讹传。文章进一步对王明清《挥麈录》中后唐刊刻《九经》为仿毋昭裔本制作的记载加以考辨,证实蜀石经与五代监本均以唐石经为底本,彼此并非相互沿用的关系,这更加说明历史上不存在毋昭裔仿五代监本刊刻《九经》之事。文章没有引入对现存上海图书馆、日本静嘉堂的几部宋刻大字本经书等版本实物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对传世文献记载的辨析为主,史料搜集丰富完备,厘清了误说由来,对早期雕版印刷的既有认知有修正之功。

金山钱氏连绵百年从事刻书事业,“钱氏一族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出版史》上的短短一句话,展现了这个书香世家的刻书功绩。据唐昱霄和钱氏后人钱基敏所著《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金山钱氏家族史》(文汇出版社,2017年)统计,家族五代十九人共校刊一千余卷图书,涵盖经学、小学、舆地、掌故、笔记、小说、天文、历算、诗文乃至西学等各类不同主题,包罗万象。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清道光间钱熙祚辑刻《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与钱熙辅辑刻《艺海珠尘》四部规模较大的丛书,而这四部丛书的校刻,都与钱熙祚之弟钱熙泰与名士张文虎三上杭州文澜阁访书有密切关系。谢辉《钱熙泰、张文虎文澜阁访书考略——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中心》一文首次充分发掘钱熙泰《钱鲈香先生笔记》的文献价值,对于钱氏和张氏三次到访文澜阁抄阅《四库全书》的历史细节,钱张两氏共同记述同一件事情的异同,尤其是钱氏家刻丛书的重要影响,都有论述。对于咸丰年间的文澜阁及阁书的借抄、利用,钱氏刻书底本来源,阁本校对价值等等,都作了客观的分析和探究。钱张二氏的抄书之举是在文澜阁被毁之前,其抄录并刻入丛书的品种,很可能反映了阁本的原貌,文中对阁本校勘价值的论述,于四库学研究亦有裨益。

近年来大量清人日记的发掘为出版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主持刊刻者的日记往往直接记录了一部书籍从收集和抄写书稿、校对、写样、雕版、印刷、流通的完整出版过程,而出版过程中形成的多种实物,如与底本相关的抄本、刊刻者的批校本、不同时期的多种印本,都可以与出版者日记相互对照,印证和揭示书籍出版的各个环节,构成可深入探索出版史的“出版文献”。刘昊《稿本〈柳树芳日记〉所见〈陆清献公日记〉出版过程——兼与现存出版实物的比较》一文便是利用这些出版文献做对照研究的出色例证。作者利用苏州博物馆藏《柳树芳日记》稿本大致还原了

道光年间吴江柳树芳刊刻陆陇其《陆清献公日记》十卷本的过程,并以柳树芳批校本、《陆清献公日记》姚椿批校本、姚椿弟姚鼐抄本和其他印本实物比较佐证,再现了陆氏日记的编刊、流通情况。陆陇其是清代学者中从祀孔庙第一人,以醇儒著称,他的日记出版是其影响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围绕日记出版,吴江一带文人学者多有参与,书出版后以赠送方式流通,也显示了书籍在江南文化发达地区于文人交往中的意义。作者根据柳氏日记判断存世版本的初印、后印之别,以及刊刻时间与刷印时间之交叠,对杨成凯、郭立暄的“一个版本”“印本”等概念加以过程性分析,这些研究也为今后中国古籍版本学中的相关界定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例证。

晚清官书局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地方官方出版机构,曾经承担着振兴文教、传承儒家经典的历史重任,“局本”风行一时,成就了古代官刻事业的最后辉煌。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晚清时段,而胡培培《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与流通》则聚焦于官书局刻本、印本在民国时期的再印情况,由此涉及民国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种种面向。文章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售书目录以及文人书单、日记信件等,对局本再刻及印行、发售的情况作了全面考察。尤以对文人书单的搜集与分析,视角新颖,论证有力。通过局本与民营书局(如中华书局)所出古籍售价及营销策略的比较,生动说明局本的受众范围及其生存境遇,颇具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眼光。

其二是对收藏活动的研究,计有五篇,涉及官府藏书印、私人藏书售归公藏、学者搜购专藏等不同内容。赵晶《“都省书画之印”新考——兼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对两方印章的时代做出新的论断,推翻了原来学界公认为元代官方藏印的认识;指出这两方明初官印的使用可能与拨付相关典籍类藏品给大本堂或秘书监等机构有关,随着中书省、礼部书画库、大本堂、秘书监的先后废止,相关典籍归翰林院保管,二印在洪武十三年后均不再使用。这些结论也为以后判断带有相关钤印的碑帖拓本、法书墨迹和绘画册页的创作年代提供了更准确的时间坐标。陈玉兰、张文娴《王韬“置书英京博物院”事件考论》一文利用英国国家图书馆购书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王韬向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出售汉籍之事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论证周密,逻辑清晰。王韬是早期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置书事件则是近代汉籍西传的著名事件,文章对其意义的评价恰如其分,公允客观。林振岳《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考略》根据日记、书札、书目等

史料考察姚氏藏书聚散始末,藏书最终售归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时被拨交,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梁帅《朱希祖藏曲活动考论——兼谈国立北平图书馆早期的戏曲入藏》聚焦于学界较少留意的酈亭藏曲,考察其来源、搜购过程和1932年与朱氏所藏昇平署文献一同悉数售予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经过。这批曲本极大提升了平馆所藏戏曲文献的规模与质量。唐雪康《天津图书馆藏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种考论》披露清末民国间重要的金石学家、收藏家周季木的五种稿本,周季木为周叔弢先生四弟,因去世早而少为学界关注。这批材料罕为人知,受益于近年来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重新进入学界视野;文中讨论的问题也颇有新意,对开拓石学研究富有启发性。

其三是兼及出版与收藏的研究,计有一篇,即莫俊《论中国古籍钤印的分类》一文。作者注意到古籍实物上的钤印,其实大都产生于出版与收藏两个阶段,将其按功能分为“出版印”和“流传印”两大类目,尝试重新构建古籍钤印的分类体系。作者对藏书印素有研究,十余年来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出将藏书印替换为“古籍钤印”这一概念,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认识。文中有丰富的例证,整体思路也比较清晰,非长期研究古籍钤印者不能为。学界有关古籍钤印的研究成果众多,作者对前人的研究批判性吸纳,后出转精,力图将古籍钤印整理工作系统化,分类科学化,以期建立更好的古籍钤印著录方法,做出了相当有益的探索。

本刊物出版的时间,正值国家图书馆馆庆(每年9月9日)周期,专刊中林振岳、梁帅二文都谈到了该馆成立早期馆藏古籍善本建设的话题。不出意外的是,两篇文章都让我们隐约看到了前辈们当年为此忙碌的身影,特别是赵万里先生。遗憾的是,由于论题的设定,文章没有对赵先生的工作延展叙述。明年是赵万里先生诞辰120周年,赵先生对国图善本の入藏和整理厥功至伟,学林多受嘉惠,期待有更多细节得以揭示,令后人记取前辈的功绩。